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33
2

人民出版社

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D. N. Aidit

BERANI, BERANI. SEKALI LAGI BERANI!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譯出

迪·努·艾地

勇敢，勇敢，再勇敢！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 $\frac{1}{8}$ · 字数 45,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1·725　定价（15）0.20元

目　录

一、政权必須同要建立的經济結构相适应 …… 3

(一)关于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的任务 …… 4

(二)关于克服經济困难的任务 …… 8

(甲)关于国家财政 …… 8

(乙)关于生产 ……11

(丙)关于对外貿易……18

(丁)关于人民的生活費用 ……20

(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任务 ……23

二、加强国际反帝統一战綫，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36

三、改进領导方法，幷有計划地开展工作，继續前进……50

亲爱的同志們!

中央委員会第一次全体会議是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我党第七次(特别)全国代表大会后的十个月举行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闡明了在当时需要闡明的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所有問題。由于我們对所有这些問題的看法一致,在这十个月以来,而且在今后,我們党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正如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要求的那样,我們党在高举**民主、团結和动員**三面民族的旗帜方面,在继續进行党的建設以及完成所有国內和国际的任务方面,都眞正作到了一个思想,一条心,一个目标。

面临着因西伊里安問題而可能和荷兰殖民主义者发生战爭、为了恢复治安而动員群众以及在防止因官僚資本家的腐蝕作用而引起經济方面的总崩潰的日益高漲的人民斗爭中,共产党人队伍和人民的思想一致已經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的同时,我們在**一手拿枪,一手拿鋤**的統一意志下正在幷将继續不断地开展斗爭。这就是說我們一面随时准备打击革命的敌人,一面准备发展生产。

由于正确的路綫和統一的意志,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沒有同荷兰殖民主义者进行全面战爭的情况下,胜利地执行了人民的三項命令。荷兰殖民主义者在还沒有进入战場前,就被迫退却了。与此同时,国內的反革命叛乱分子基本上已經肃清。这一切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人民已成功地爭取到一定程度的民主,成功地加强了以"納沙貢"① 为核心的民族統一战綫,幷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

动員了我們民族內部一切革命的潜力，特别是在人民的全力协助下动員了武装部队中的爱国力量，同时也赢得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其他新兴力量的援助和支持。

沒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已經起来了的群众。他們不仅将完成解放西伊里安的斗爭和恢复治安，而且将扫清一切阻擋人民革命运动的障碍，——如紧急状态（战时戒严法令），官僚資本家、买办和地主，总之，所有反对《政治宣言》和反对以"納沙貢"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那些人——而继續前进。

目前摆在我們面前的三項实际任务是：第一，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第二，克服經济困难；第三，反对新殖民主义。

只有我們继續坚决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把党的建設任务和国际任务結合起来，这三項国內任务才能很好地貫彻执行。

当我們对国內任务、党的建設任务和国际任务都明确了之后，紧跟着我們还必須**敢想、敢說和敢做**。

我們已經把一九六三年規定为"勇敢年"。这和苏加諾总統向印度尼西亚人民提出的以敢于冒風險的精神过生活的号召是相符的。把今年称为"勇敢年"，这是极其符合人民的願望的，他們希望千百万人民群众队伍的先鋒队能更勇敢地領导他們。也正因为如此，我們才把这个政治报告題为"**勇敢，勇敢，再勇敢！**"。

同志們，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这次中央全会之間的时期內，我們失去了我們亲爱的**苏哈迪**和**沙尔米迪·烏达尔約**两位同志。让我們大家起立，靜默志哀，向他們为了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偉业而作出的所有貢献表示我們的敬意和感謝。

---

① "納沙貢"是印度尼西亚文"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主义者"的縮写。——譯者注

一、政权必须同要建立的經济結构相适应

同志們！

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爭取民主和爭取成立互助合作內閣”的口号鼓舞下，在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总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們对內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問題是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即**民主、团結和动員**，以走向**在政治制度和在人民的政治自由方面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具体地說就是走向：**成立‘互助合作內閣’，撤銷紧急状态，以及重新考虑現行的紧急状态法令**。”到目前为止这个結論仍然有效，因为在最近十个月內我們所取得的成就还沒有超出这个政治任务。

工作內閣成立以来，包括調整以后的时間在內，到現在已三年半了。这个內閣的政綱称为三項政綱，即：（一）**向人民提供足够的衣食**；（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三）**继續进行从經济上和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西伊里安）**。

政綱的第一項完全沒有实現；政綱的第二項已經部分实現，这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一全面斗爭約章”集团和伊斯兰教国运动一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等反革命叛乱分子已經被击敗了，但这并不是說，人民和国家已經得到安全；政綱的第三項也已經部分实現，这表現在根据正式协議西伊里安即将移交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这并不是說，在經济和政治方面，特别是在經济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已經結束。

苏加諾总統把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話題为“胜利年”是正确的，因为西伊里安問題的解决和反革命叛乱集团的被肃清，的

确是巨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說政綱的第二和第三項已經实現了。因此苏加諾总統还强調說，已經取得的只不过是胜利的**开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深刻地认識到，我們所取得的胜利只是初步的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說，这样的胜利还不保險，还不稳固。尤其是我們想到向人民供应足够的衣食并沒有实現，人民的衣食甚至越来越困难，而且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无論在西伊里安或者在我們共和国的其他地区，仍然在自由活动。

由于这些原因，我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迎接"**胜利年**"时，肩負着三項最紧迫、最实际的任务，即第一，**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第二，**克服經济困难**；第三，**反对新殖民主义**。

我們执行上述三項任务，是同执行归納为党的三面旗帜的党的总路綫分不开的，是同在执行党的总路綫过程中出現的重要的和有决定性的任务，即归納为民族的三面旗帜的任务分不开的。为此我們提出了"**高举两組三面旗帜执行三項任务**"的口号。

三項任务是目前局势发展所产生的所有实际任务的概括。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认眞地完成这三項任务，因此我們需要比較詳細地談一談这方面的問題。

(一)关于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的任务

为了巩固我們已取得的大胜利，我們必須毫不懈怠地加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西伊里安**的力量，以便尽快地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版图，以便使它不致于变成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地区，不致于被帝国主义者变为自由进行投資的場所，結果使帝国主义一旦认为有必要时就能借口"保护他們在該地区的財产"而派遣軍队到那里去。那就将意味着西伊里安将再次变为一支对准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手枪，但这时就已經不是腐朽了的荷兰殖

民主义者的手枪，而是侵略性和掠夺性最强而又最蛮横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手枪了。

令人十分高兴的是，西伊里安的印度尼西亚儿女在解放西伊里安斗爭的現阶段中，积极地起来要求尽快地使西伊里安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管轄下。这也是在反对西伊里安的新殖民主义斗爭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巩固治安的成就方面，进步人士，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把治安問題当作是自己的問題，因此必須和負責治安的有关方面进行良好的合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諾总統在泗水紀念“人民的三項命令”发布一周年的大会上，宣布取消紧急状态。取消紧急状态并不是說让我們在安全方面减弱我們的警惕性，使反革命分子有机会进行活动。相反地，取消紧急状态必須进一步提高我們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同时必須給人民以自由，使人民无論在提高生产方面或者在打击反革命方面能够发揚战斗精神，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为了剝夺人民在取消紧急状态以后将获得的民主，官僚資本家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正在竭力准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过去，他們早就企图通过保持地方上的“政、軍、警、法四位一体”的独裁統治，把他們的爪牙派到乡村去实行控制，为了夺取已有的民政机关的职权而建立他們自己的机关等等严重地破坏民政机关所建立的秩序的办法，以便实現沒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右翼社会党人为了实現沒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尽力散布他們的反动的建議。这是和首席部长哈吉朱安达工学士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棱罗举行的全印度尼西亚省长会議的致詞中所发表的声明相違背的。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指出：“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起，将正式取消最高战时掌权者和地方战时掌权者，同

日，中央和各地方的权力将全部交还給民政机构……地方长官在他的地区內行使政权和維持治安的权力。这就是說，为了維持本地区的公共秩序和安全，在現行法权范圍內，地方长官有权制定政策和基本路綫，官方或非官方对此都必須遵守和重視。”

一切民主和爱国力量不能犹豫和后退，相反地必須敢于阻止旨在实現沒**有战时戒严法令的战时戒严**状态的企图。总之，当战时戒严状态取消之后，我們必須认眞地和全面地实現苏加諾总統所說的“《政治宣言》指导枪杆子”。

为了使紧急状态的取消眞正地給革命活动带来自由，同时使人民的創造力得到解放，而不是給反革命分子以方便，我們党认为成立有“納沙貢”参加（不是作为核心）的**协助革命領导协商机构**是有积极的一面的，这个机构可以协助苏加諾总統在沒有战时戒严状态的情况下行使最高职权以完成現阶段的革命。

我們必須巩固的另一个巨大胜利是**民族陣綫**。尽管它經常遭到国家机关本身的“留难”和“束縛”，我們仅仅在两年的时間內就成功地建立了民族陣綫，其成員包括一切凡是接受《政治宣言》的政党、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这是在加諾兄領导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的一个偉大胜利。这再一次证明：只要哪里有以“納沙貢”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那里就不出乱子。但是这并不是說我們就不要进行反对冒牌的《政治宣言》支持者的斗爭。

当反动分子破坏民族陣綫不能得逞之后，他們继續在散布解散一切政党而把民族陣綫变成独一无二的党这样的思想，以便搗乱。他們不仅要危害政党的生存，而更主要的是想破坏民族陣綫本身，因为他們知道，民族陣綫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存在着各政党和群众团体之間的良好合作。

維护民族陣綫是同維护政党制度分不开的。我們在民族陣綫

中团結起来，就是为了在执行共同綱領，即《政治宣言》时团結起来，并不是要把不能溶化在一起的东西溶成一体。

关于这一点加諾兄曾經很正确地說过："**我們不是要民族主义者改变他們的思想信仰变成伊斯兰教徒或者变成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要馬克思主义者或者伊斯兰教徒变成民族主义者，我們所希望的是这三派能够和睦相处和团結起来。**"（《**在革命的旗帜下**》，第5頁）

加諾兄在他的《**实現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这篇文章中写道，必須要有一个眞正的**先鋒党**，他还进一步解釋說："还可以有其他政党……不当指揮官，……而只当僚佐……"由此可見，加諾兄的思想是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及其在印度尼西亚的追随者的思想完全沒有相似之处，完全不是要建立一个反动的資产阶級政党而鎮压工人阶級。如果我們还記得加諾兄在《在革命的旗帜下》第256頁曾写道："我們的軍队是眞正的平民的軍队，……一个从农民取得很多人力的軍队，但是工人的队伍，无产阶級是我們的先鋒队"，那末，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因此，有一个以上，一个以上政党存在并不是什么禁忌。实际上現在我們国家有十个政党，至于哪一个党当先鋒，要由人民来决定。只有为維护人民的利益和为人民的斗爭的忠心耿耿的党，才能取得这种先鋒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主观願望，也不是根据什么法律或条例所能决定的。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識到，在人民斗爭中不付出什么代价是不能取得这种先鋒地位的，仅仅根据工人阶級及其政党必然起領导作用的历史发展規律也是不能取得这种先鋒地位的。只有在維护人民利益的斗爭中表現出自己的无限忠誠、不怕牺牲和勇敢无畏的政党才能取得这个地位。

在反动派分裂民族团結的活动中，最近期間出現了一种**新馬**

斯友美主义，那就是他們想把神道的原則从"建国五原則"分割出来，并利用这个原則到处进行威胁，并煽起宗教狂热。他們完全抹煞"建国五原則"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一个原則或互助合作原則，它包含着社会中的一切力量和各种思潮之間实行**革命的忍让**的意思。

民族陣綫已經而且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在实現三項任务、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克服經济困难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爭中，民族陣綫也能够起很大的和积极的作用。

(二)关于克服經济困难的任务

在談到第二个任务——克服經济困难——的时候，首先需要先談一下有关国家經济情况的几个方面。我們扼要地分析一下以下几个方面：(甲)**关于国家財政**；(乙)**关于生产**；(丙)**关于对外貿易**；(丁)**关于人民的生活費用**。

(甲)关于国家財政

临时人民协商会議确定，金融稳定是建設中很重要的因素。在各个有計划的建設阶段中提高各部門的生产是主要的目的。国內必需品的流通問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取决于生产的发展。金融的稳定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反过来，財政不稳定又会破坏生产。这就是說財政政策必須为生产服务，而不能执行其目的不在促进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反而牺牲生产或者使生产更加恶化的錯誤的財政政策。事实证明，总統的財政方面的助手沒有成功地执行这样的財政政策，也沒有执行临时人民协商会議所作出的稳定金融的决定。

苏加諾总統曾提到，为了解放西伊里安的斗爭，在执行人民的三項命令和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一全面斗爭約章”集团和伊斯兰教国运动一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等反革命分子，需要有足够的經費，这是正确的。这一項政治任务必然要影响到財經方面。但是，經营管理不善使經济和財政恶化，这也是事实。在执行人民的三項命令的时候，不应当，也不容許发生这种情况。那些經营管理不善的人錯誤地利用人民的三項命令为自己謀求利益。因此，在坚决貫彻苏加諾总統在泗水作的关于“胜利年”的报告和关于人民的三項命令一周年的报告时，消灭財政經济方面經营管理不善的現象，这是十分重要的。

显然，目前在国家財政管理上不能保证效率，所以在使用上未能防止浪費現象。这些結果都可以从社会中看到。关于国家財富使用不当的消息，現在越来越多，而沒有傳开的一定会更多。財政方面的管理不善，除了浪費以外，主要的还表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級有关机关的监督沒有起到应起的作用。更不可能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即群众的监督，也就是政府官員所宣揚的所謂“社会监督”。仅仅以为实現民主管理而成立的企业委員会或諮詢委員会等机构这一工作来說，用苏加諾总統的說法，就进行得像蝸牛爬行一样。

（二）由于国家財政管理組織中的有效因素——**配合工作**沒有实現，因此不能体現建設部門在国家財政分配中的优先地位。虽然有了优先发展的規定，但是在实际經費的分配中却沒有体現原訂的先后順序的規定。其后果是次要部門挤掉了应該給予优先照顾的部門。

（三）**国家財政收支預算**，无論在經常費用支出和建設費用支出方面，都还沒有貫彻执行《政治宣言》。这就是說国家財政收支

預算沒有体現根据《政治宣言》而制訂的財經方案。《政治宣言》及其执行方針規定了国营經济必須居于領导地位，但是目前的国家財政收支預算还沒有改变过去依賴直接稅和間接稅作为国家收入的性质。国家的收入不是依靠現有的国营企业或其他生产部門的收入。在解决国家收入的困难方面，仅仅采取了金融方面的技术性措施和停留在增加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办法上，这是从社会上取得更多錢財的最簡易的办法，但却是加重人民的負担、遏制国家經济发展的办法。而对那些从通貨膨脹中撈取了大量利潤的人却一点也沒有触及。稅收政策不是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相反地，通常是取之于人民而流进了官僚資本家和新暴发戶的口袋。

（四）应該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和国营貿易公司**）还沒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地，由于这些企业把貸款大量地用在非生产性的支出上，以及經常的鋪張浪費，而仍然成为国家財政的負担。所有这一切，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經营管理不善。

印度尼西亚盾的价值一年年地急剧下降。购买食物时，盾值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四或者是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六。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底雅加达的食品物价指数和一九六二年一月初比較，已經增加了三点二倍，而同期工資平均只增加百分之三十，相形之下，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了。

根据上述金融的現实情况，有必要在財政方面采取如下各項根本的和技术性的經济措施：

（一）国家收入必須依靠生产、运輸和国內外貿易部門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和国营貿易公司）的加强經营管理。通过在經营管理方面对人事和机构的整頓和整肃，提高生产能力或提高生产水平，以期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不是通过提高价格和稅率的办法来

增加国家的收入。

(二)直接税和間接税收入的增加,不应該通过提高税額,而应該是通过正常的經济发展。商业部門的税收应該根据商品的銷售量征收。公司税应該通过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提高。关于增加人民負担的其他税收,如超額利潤税、成本税等,必須廢除或予以降低。

(三)必須通过开发最长在一年以后就能立即投入生产的自然資源的途徑作为新的收入来源。例如海上捕魚业、林业、玉米或烟草种植业等。

(四)控制外国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外汇收入,从而弥补外汇的不足。这就是說应該像对待种植业、工业等方面的外国企业一样来对待外国石油企业,除非是政府分配的准予轉移的利潤和服务費等外汇外,一律不得自己掌握外汇。

(五)国家的支出应該根据优先发展建設的原則尽量有效地使用。盾或外汇基金的分配必須符合上述先后順序。

(六)为了逐步解决通貨膨脹,貨币的流通必須要有計划。这就是說发出的貨币必須以更大的产值来平衡。在这个問題上,必須根据**貨币和商品的相互关系**的原則,貨币流通量不应該脫离社会所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供应。

(乙)关于生产

人們已經足够地了解和体会到,农业、种植业、矿业和民族工业的生产一般說来对印度尼西亚經济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这种作用对于印度尼西亚經济将摆脫对外国帝国主义經济的依賴性还是仍然保持着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性质这一

問題是具有决定性的。換句話說，增加生产的政策应該是为了我国經济的独立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們必須继續为爭取把殖民地經济变成以**农业和农場为基础和以工业为骨干**的独立的民族經济而斗爭。这一斗爭有助于彻底实現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要求的政治斗爭。

短期的国民生产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像精确的晴雨表一样，可以用来衡量我們为把殖民地經济变成沒有依賴性的民族經济而进行的斗爭已經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对各部門的生产下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工人阶級加以責备，甚至实际上采取了使目前生产状况更加下降的行动，而只高喊八月革命的目标、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公正和繁荣的社会，那就无非是讲空話而已。苏加諾总統在《革命—社会主义—領导》中說得很对："……**生产、經济是国家的命脉，因而反动派經常集中破坏国家这一命脉。**"

因此，漠不关心的态度，責备工人阶級的态度或者使目前生产更加下降的行动，就是意味着直接或間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帮助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內反动派的破坏工作。

相反地，如果我們能够在质量上和数量上使生产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降低生产成本，創造发展生产力的条件，总之，假如我們消灭了在生产方面形形色色的經营管理不善的缺点，同时消灭在分配、交通、財政等方面經营管理不善的現象，这就意味着：

（一）具体实施了短期的衣食綱領；

（二）协助国家稳定金融状况；

（三）一方面大量地节省外汇（假如能够停止大米的輸入和减少其他消費品的輸入，尤其是紡織品的輸入的話），另一方面增加生产和輸出現有的主要原料，并輸出国內多余的商品以扩大輸出品种，来增加外汇的收入；

(四)为把殖民地經济变成不依賴于外国壟断資本主义經济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經济的斗爭取得胜利奠定巩固的基础。

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生产部門的状况都呈現着一幅十分暗淡的景象。

政府本身在最近的互助合作議会上证实了这样的結論："**一九六二年的生产趋势是下降的，甚至是朝着崩溃方面发展的，尤其是国内消費品的生产和出口产品的生产。**"

这一結論是对的。各生产部門的生产一般地說都比上一年下降，而只有一、二个生产部門的生产是"稳定"的或者稍有"上升"。从必須充分发揮全部生产能力的角度来看，我們的生产的确面临着崩溃的危險。經营管理不善的現象随处可見，統計工作和有关主要原料的生产数字的搜集工作也是如此，因此确定产量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官方的正式統計数字，还应該估計活生生的現实，尤其应該估計到生产实踐方面的因素。

生产实踐中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的經营管理，它是由人和組織机构組成的，而人終究是最重要的因素。能否利用自然資源和現有的生产資料为社会創造有用的物資，取决于作为管理者和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的人。如果經营管理者对生产經营管理不善，生产就会下降而生产成本却很高。結果加重了作为消費者的人民的負担。

此外，目前生产下降和走向崩溃也是由于大量的貪污、浪費和走私所造成的，这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和十分反动的經营管理不善的現象。

在这里只举出四、五种最基本最主要的生产就容易证实以上指出的关于数字混乱和生产下降的情况。

十多年来由农业部(現在改为农业和土地部)管理和領导下的

大米生产，至今还沒有一个統一的肯定的可靠数字。农业和土地部規定一九六二年稻谷生产的数字为一千九百八十万吨，而中央統計局規定的数字却更低，只有一千七百八十万吨。“为了避免这一数字的混乱”，成立了以国家研究事务部部长朱內德为首的委員会。这个委員会根据上述两个数字的平均数規定一个“折衷数字”，即一千八百三十万吨，但这个数字还远远低于临时人民协商会議所規定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指标即二千零四十万吨，甚至低于一九六一年的指标即一千九百二十万吨。

中央統計局本来应当十分仔細、謹慎和埋头苦干地工作，但看来它是更願意走最簡便的途徑，它只是从一九六二年二千零四十万吨的生产指标中扣去相当于二百六十万吨稻谷的大米輸入量，即 20,400,000 吨－2,600,000 吨＝17,800,000 吨稻谷。这种完全不科学和非常輕率的工作方法大大地降低了中央統計局的威信，并使那些很认眞地引用中央統計局的数字来分析情况的人发生錯誤。每一个爱国者、科学工作者和作家已經习慣于引用确切的数字，一定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与其使許多人受騙和使用錯誤的材料，不如撤換中央統計局这种領导。

更不幸的是，外国人著书时就是根据中央統計局的这些錯誤数字，而这些书籍輸入我国之后，官員、大学生等就引以为根据。

紡織品生产方面的数字更加令人費解和混乱。根据国家計划委員会的統計数字——这数字已由临时人民协商会議所通过而后来又經国家計划委員会工作机构加以修改——手工織机，根据紡織工人群众組織和私营紡織业公会直接提供的材料，大約有十五万台，机器織机大約有一万八千台，其中单幅机器織机九千台，双幅机器織机九千台。

不久以前民間工业部长第一助理宣布說，全部手工織机已增

加到四十万台，而机器織机增加到一万九千五百台，并解釋說，**按这样的設备能力来說，实际上現在的生产潜力已經能够实現临时人民协商会議規定的一九六八年的指标**（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民族經济报**》），即十七亿米，以一九六八年人口总数为一亿一千一百二十九万人計算，每人每年平均有十五米布。这与政府公布的数字相差多远！按政府公布的数字，一九六一年紡織品的产量为四亿二千八百万米，而一九六二年估計为四亿六千万米以上，这就是說只达到民間工业部长第一助理所說的应該达到的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关于**砂糖的生产**数字虽然沒有出入，但是却显現了一幅十分暗淡的图景。临时人民协商会議規定的指标为九十万吨，但政府在它一九六二年的計划中已削減为七十二万吨，而事实上一九六二年砂糖的生产估計低于六十万吨，这个数字同一九六一年（六十四万吨）和一九六〇年（六十七万五千吨）砂糖的产量相比，显然是下降了。

据政府公布的数字，一九六二年大农場**橡胶的产量**是二十三万吨，这个数字比一九六一年的产量（二十二万八千吨）可以說相去不远。但比一九五三年的产量（三十万零九千零九十八吨）却大大地下降了。民間橡胶产量从一九六一年的四十四万吨下降到一九六二年的四十万吨。据农业和土地部长在印度尼西亚出口商临时联合会工作会議上所說，每年通过走私輸出的橡胶估計約为三万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民族經济报》）。但是如果我們根据印度尼西亚的統計数字和馬来亚的統計数字来研究一下印度尼西亚輸出到新加坡的橡胶数量，就会发現两者有很大的出入：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的七年期間，两者相差不少于一百零四万四千吨，或者說是每年平均約十五万吨。这就是說，每年走私到

新加坡和馬来亚的橡胶数为农业和土地部长估計的全部橡胶走私数的五倍。

最近**椰干出口**方面的走私活动在苏拉威西地区和安汶海面上已經达到異常猖獗的程度。这种情况是由于一些作为某些椰干走私集团的代理人的椰干中間商的不法行为和投机倒把所造成的。他們出的价錢远比国营貿易公司向椰农收购的价格高。尤其是这些中間商还从外国带进来許多非常"吸引"椰干生产者的商品，如紡織品、玻璃器皿、餐具、茶杯、毛織品、香烟等等。

这造成了椰干輸出額的大幅度下降。据农业和土地部长在"木本植物更新和栽植基金会"董事会議上所提供的材料，椰干輸出額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間每年平均五十五万吨下降到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間每年平均二十九万吨，而以后又下降到十三万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印度尼西亚通訊社报道）。这些数字同发表在《商情統計一覽》上的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四月的数字（第48頁）出入极大。它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国营貿易公司为滿足本国肥皂工业和椰油工业的需要而收购的椰干数量也大大地下降了。

关于其他出口原料如咖啡、茶叶、烟叶、棕櫚油、油棕果、麻纖維和木棉，只要調查一下一九五七年到現在的数字就可以看出，除了咖啡生产稍有增加之外，其他的生产都下降了。

陆运和海运方面的停滯現象不但已經打乱了一般的商品的分配和流轉，而且也給生产造成混乱。

許多生产部門衰退、下降、甚至破坏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各种形式和表現的經营管理不善現象的到处发生。以大米生产方面的經营管理不善为例：稻谷中心站已支出了好几十亿盾，但并沒有取得相应的效果。进口的肥料品种很多，但使用时沒有因地制

宜。稻种在仓庫里大量"发芽",而分給农民的那一部分,却由于选种和保管不善而不能使用。农业生产委員会沒有建立起来,也沒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的有效监督。在紡織业生产、农場生产等方面也可以举出关于这种經营管理不善的現象的具体的和令人信服的例子。

在国营企业,不論是生产企业还是分配机构或者是国内外貿易机构,已經被經营管理不善这个瘟疫从許多方面所侵蝕,因而国营經济部門不可能对整个国家經济生活加以領导或者居于領导地位。国营經济部門沒能取得应有的領导地位,其結果是私营的民族經济和进步的国内私营經济陷于混乱和面临破产的危險,以至建立独立的民族經济所迫切需要的国内資金和人力处于冻結状态,不能用于生产。在动員資金和人力时,必須坚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如强行合股,改換名字等等。

現有的私营企业十分缺乏主要原料、輔助原料和零件配件,其中大多数企业甚至得不到这些材料。而建立新的私营企业又有許多許多困难,因为要取得营业許可証非得經过复杂而麻煩的手續,同时事实上还有可能受到很重的营业稅和財产稅的威胁。

在提高粮食生产方面,我們党应該更加坚决地为实施对耕种者有利的《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实施《土地基本法令》而斗爭,使眞正最需要土地的雇农和貧农能够分到地主多余的土地,并且反对这些法令执行中的違法行为。

应当更加积极地建立劳动人民的合作社,尤其是生产合作社。应当把目前已經成为广泛群众运动的"千方百計运动"开展得更有秩序、更有領导,并通过吸收更多的农业专家到这一运动中来和举办讲习班,进一步提高技术。通过这些活动,我們就和农业生产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直接发生关系,我們就能为克服目前广大人民

群众遭到的生活困难做一些可能做的工作。当然只要在目前的政权和人民群众之間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切活动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丙）关于对外貿易

我国对外貿易仍然是国內經济生活的晴雨表，因为印度尼西亚經济純粹依賴輸入的性质还沒有改变。国家財政收入还有百分之六十是依靠进出口。国內的生活消費品和重要生产原料实际上是靠进口的，而这必須由出口的收入来支付。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事实表明，在輸出方面除了石油外都下降了，即有一批重要的出口商品的輸出总額和輸出总值都下降了。一九六〇年到目前輸出的情况可由下列数字表明：

1960 年	279 亿盾
1961 年	236 亿盾
1962 年（上半年）	97 亿盾

这一事实說明了在执行八年計划时期內的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外汇收入越来越減少了。結果国內消費和生产需要的傳統进口商品，有很多被削減了。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大米生产指标沒有完成，自然削弱了向其他部門支撥外汇的能力，因为在一九六三年显然沒有能按八年計划的規定停止大米的进口。

除了石油外，一九六一年貿易收支的逆差是相当大的：

	出　口	进　口	逆　差
1961 年	235.58 亿盾	332.73 亿盾	97.15 亿盾
1962 年（上半年）	97.05 亿盾	144.78 亿盾	47.73 亿盾

相反地，石油輸出却不断上升，外汇收入从一九六〇年九十九亿盾上升到一九六一年的一百一十七亿盾，而一九六二年的头八个月內就已經达到将近一百亿盾外汇。但是，这些外汇的收入仍然被外国資本所控制。

印度尼西亚显然还沒有从在总額和总值方面不断上升的世界进出口貿易的发展中得到什么好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場和遭到危机的資本主义世界市場的竞賽中，印度尼西亚还沒有摆脫目前正在动蕩中的傳統市場(讀作依賴于資本主义市場)。为了摆脫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危机的影响，所有負責对外貿易的官員必須在經济方面认眞地执行积极的独立政策，加强同新兴力量国家的合作。

鉴于出口收入非常有限，所以在一九六三年必須审查进口的商品。坚持給生产方面的工程項目以优先地位，为了有效地使用現有的外汇，需要停止奢侈品和其他非急需商品的进口。

为了通过消除国內外差价，推动出口而实行的《外汇許可证》条例显然已經失敗了，給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坏的影响，这是由于《外汇許可证》規定的牌价太高，造成物价的空前高漲。出口商由于国內外差价而遭受損失的問題本来不应該通过《外汇許可证》条例解决。如其他一些需要国际支付手段的国家通常所实行的那样，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給生产者以奖金或补貼，而政府則以較低的国际价格輸出其商品。这样，爭取外币的目的可以得到保证，而国內物价也不致于因为《外汇許可证》条例提高牌价而引起波动。当然，必須注意外汇的使用，这里再重提一下，外汇必須有效地使用，不要像过去那样浪費于购买建設不需要的商品上。

保证更多的出口收入的工作之一，就是加紧肅清走私活动。有百分之几十的出口收入实际上沒有进国庫，这已經成为公开的秘密了。椰干、胡椒、橡胶、錫等等出口商品大批走私的現象，应当在一九六三年加以肅清，使国家从出口方面得到的收入能够有所增加。

为了便于监督向人民收购主要出口商品的工作并使之进行得順利，国营出口公司必須加强主要商品的出口工作。各个地方出

口商品的收购工作由国营出口公司的分支机构进行，这样可以减少生产者由于中間商的欺騙而遭到的損失，而这些中間商有的同走私犯有关系。

为了实現这些，也需要有一批眞正拥护《政治宣言》的人，即需要有爱国的、誠实的、有才能的、民主的和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来管理对外貿易的工作。沒有这些就不能推动出口工作和防止攫取国家对外貿易收入的行为。

（丁）关于人民的生活費用

有計划的建設能够胜利实現的条件，是生产者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热情。**应該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激发这种热情**。只是从精神上激发是不会产生很大的效果的，因为能否提高生产率最后还是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在生产过程中始終需要給予劳动者最起碼的条件，使他們能够生存下去，幷且体力上能继續从事生产。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在发揮工人劳动热情方面存在着几个主要的缺点，而工人和农民都是进行建設的支柱。这幷不是說在这期間工人和农民只是提出要求而不願意自我牺牲。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和农民沒有等别人要求早已心甘情願地作了自我牺牲。虽然工人和农民承受着下列統計数字所表明的日益繁重的生活負担，但是他們仍然关心幷以实际行动来克服經济困难。下面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員的四口之家在雅加达的生活費用的指数：

1953年——100	1960年——409
1958年——202	1961年(第二季度)——463
1959年——293	

这一指数充分地表明了，生活費用不断地上漲，而工資的增加却远远地落后了，或者远远地落在上述生活費用所反映的物价上

漲速度的后面。

农村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以下爪哇和馬都拉农村十二种主要食品和紡織品物价指数的上升情况可以說明这一点：

年　份	十二种主要食品	紡織品
1953 年	111	100
1958 年	263	238
1959 年	307	592
1960 年	388	926
1961 年	1,243	836
1962 年（3 月份）	1,910	1,176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必須购买大部分或者全部生活必需品的农民，特别是貧农和雇农，遭受到生活費用猛烈上漲之苦。

一九六二年的現象更为严重。根据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底的統計数字，雅加达消費品价格上漲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份的百分之四百二十。毫无疑問，价格上漲实际上远远超过官方的統計数字，而工資的增加平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　　*　　*

从上述关于經济情况的事实可以看出，沒有什么迹象表明我国的經济情况在短期內将会好轉。但是，如果說目前經济困难将是恶性的循环，是完全不对的。只要人民的力量充分动員起来，而經营管理不善的普遍現象被肅清，这些困难一定能够克服。

去年十月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发表一篇題为**《本着人民三項命令的精神为解决經济問題而继續前进！》**的声明，得到了人們热烈的欢迎，他們广泛地談論这一声明，所有认眞考虑我国經济情况的人都把它当做重要的参考材料。声明中提到：

“在研究了国家和人民面临的暗淡的經济情况后，是在經济方

面采取根本措施的时候了。目前的技术行政措施或者财政金融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性质，不能指望它能治好目前财政經济的严重創伤。”

在声明中我們也建議采取下面一些措施：

（一）整頓财政經济机构，改变官僚主义的财政經济机构的組織結构；

（二）尽快地成立民主的社会监督机构，如企业委員会、生产委員会、分配和交通监督委員会、进出口监督委員会等等；

（三）保证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使他們能够发揚战斗精神，卷起袖子来克服目前的經济危机；

（四）修复和改进生产工具和陆海空的交通工具，并根据資本、設备和人力的条件逐步地有計划地实行現代化；

（五）改变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貿易政策，尽可能地扩大同社会主义各国貿易的数量和总值，俾能避免資本主义国家經济危机所造成的恶果；

（六）在經济方面反对新殖民主义，把威胁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独立的新殖民主义的問題，包括欧洲共同市場問題提到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議上加以討論；

（七）财政政策必須为生产服务，而不要反过来让錯誤的财政政策断送了生产。

在这一声明里我們也提出关于印度尼西亚經济建設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則，即“**建設政策必須建立在这样的认識的基础上，即发展国民經济要以农业和农場为基础，以工业为骨干**”。坚持这一原則就意味着必須首先实現彻底的土地改革，因为它是国民經济建設的基础和資金的来源。只有实現了这一原則，印度尼西亚才能用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解决人民的衣食問題，同时才能够为国家工

业化奠定基础。

关于建設**資金的来源**，除了农业和农場之外，我国已經相当发展的矿业必須发揮重要的作用。

农业和农場是印度尼西亚主要收入来源（除了現有的矿业外），不重視农业和农場，我們的衣食永远得依賴于外国，而且我們从国外进口工业必需品的可能性仍然是很有限的。我們不願看到我国一直处于农业国地位幷依賴外国市場，因此我們必須建立我們的經济骨干，以便能够自力更生，而这一骨干就是工业。

因此，克服印度尼西亚經济困难的**眞正**出路幷不是向外国乞求借款或者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变成投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国資本的佣人，而是必須**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經济**，这就是說必須敢于**通过牺牲城乡少数大剝削者即官僚資本家、买办和地主的利益，而維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改变国内的社会制度**。为此必須有与此相适应的政权，即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政权。

每一个人民領导人面临着这样的問題：反对大剝削者来維护人民，还是反对人民来維护大剝削者。这是衡量他是不是革命領导人的标准。中間路綫是不存在的。

（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任务

第三項任务是反对新殖民主义。我們最近一次的代表大会已經闡明这个問題。生活证明，我們那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結論是正确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壟断資本家正在进行旨在操纵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經济和政治的种种活动，目的是想保持他們在这些剛取得独立的国家的經济中原有的地位。此外，他們还企图以經济"援助"为名，夺取新的地位，設法

把新独立的国家拖入軍事集团，并在这些国家里建立軍事独裁和軍事基地。

美帝国主义利用"稳定經济計划"的名目，企图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变相的"爭取进步联盟"(这是針对拉丁美洲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美帝国主义的"經济稳定"和"政治稳定"。为了同样的目的，美帝国主义沒有忘記向印度尼西亚兜售所謂"和平队"。

在西伊里安問題解决之前，印度尼西亚人民把荷兰帝国主义当作头号敌人，同时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危險的敌人。現在，荷兰殖民主义在西伊里安的历史肯定要完結了，如果仍然认定它是头号敌人，那就沒有意义了。在西伊里安的联合国临时行政机构与其說是为荷兰的利益服务，不如說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因此，目前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危險的头号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从美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影响，从它的投資，从它的軍事和文化滲入来看，它都超过其他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千方百計地忙着用煽动性的口号扩大和巩固它在印度尼西亚已有的經济基础和政治影响。

它所采用的方法是：

甲、增加現有的美国投資，特别是在石油工业方面的投資；

乙、采取新的方式扩大美国的經济"援助"。

从壳牌石油公司(它的資本有一部分是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投資的增加，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投資的增长情况。从一九五四年起到目前为止，这些石油公司的投資增长情况如下：

壳牌石油公司	增加 78,000,000 美元 (30,000,000 英鎊)
美孚石油公司	增加 40,000,000 美元
德士古石油公司	增加 47,000,000 美元

根据美国大使琼斯向美侨协会所作的报告，从一九五〇年到現在，美国提供的經济“援助”已达六亿三千九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消費資料。这一切就是美帝国主义已經得到的立足基础。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作新的努力来取代荷兰帝国主义的地位。美帝国主义利用爭取“經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口号，制定所謂“特别援助”計划。据說，这种援助是**长期性**的，印度尼西亚似乎已經变成荒地，无法自力更生，必須永远依賴外国的援助。他們所說的“政治稳定”，其实就是在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他們的人”的稳定。

这种附有政治条件的援助，損害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自由和主权。

印度尼西亚官僚資本家和买办对外援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他們濫用职权，妨害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則实行援助。他們大吹大捧帝国主义的經济援助，因为这种援助总是带有加强城乡大剝削者私人的經济基础的**东西**。

由于經济和財政方面經营管理不善的現象越来越普遍，所以外援的使用显然不能保证使我国的經济发展获得最大的好处。除了获得了美国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相当多的援助之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附任何侵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主权的政治条件的援助还在继續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不是建設經費的主要来源，仅仅带**輔助**的性质，它們希望印度尼西亚在短期內能够自力更生而不必老是依賴外国的援助。

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的历史还不长，但是，如果在我国的經济和財政領域中沒有破坏活动和經营管理不善現象的話，那么这种援助是足以使經济建設順利进行的。根据亚洲与远东經济委員会的統計，社会主义国家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援助

如下：

到 1957 年底　　137,000,000 美元

到 1960 年底　　466,000,000 美元，或上升为 340%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又有增加。

美援的信用在經济落后的国家中日益下降，这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日益扩大的因素之一。亚洲与远东經济委員会的統計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給落后国家的援助有如下的增加：

到 1957 年底　　822,000,000 美元

到 1960 年底　　3,198.000,000 美元，或上升为 390%

目前美帝国主义还想通过私营建設銀行把它拟議的新援助交給它的同謀者。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的目的在于巩固它的走狗的經济利益，以取消应当占領导地位的国营經济的作用。这是和《政治宣言》相抵触的，即使美帝国主义表示"贊同"《政治宣言》，琼斯甚至說要把美国資本主义企业（私人企业）同"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的关系协調起来。

現在，事实越来越证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互助合作議会討論私营建設銀行条例时所提出的警告的正确性，那就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資本渗入到私营建設銀行的危險是存在的。在这方面，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并且制止外国帝国主义通过私营建設銀行进行的冒險行动。

荷兰帝国主义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危險的敌人，因为它仍然拥有为数相当大的投資（巴达夫石油公司，等等），因为它还要就已被接管和收归国有的企业的問題提出无理的要求，因为它还保有旧的政治关系，并力图改头換面重新建立这些关系。

最近，英帝国主义出来推行它的馬来西亚計划，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也出来实行它們的經济渗入，这一切必然引起印度尼西亚

人民的警惕。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活动的所有帝国主义当中，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危險的头号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反对新殖民主义危險的斗爭应以美帝国主义为首要对象。

有人怀疑并且問道：难道新殖民主义对印度尼西亚也是严重的危險嗎？这个問題的产生，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是通过武装斗爭获得民族独立的，这和印度或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不同。我們共产党人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明确的：**十分严重**！我們这样回答并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证明，对新殖民主义的危害性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

六年多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上，我們基于深刻的分析，得出結論：在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方面有三种力量和三个方案。

第一种力量，**頑固**力量，也就是反动力量；他們的方案要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为仅仅在形式上独立，而在实际上則向帝国主义屈服，并且維护外国大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的国家。他們說这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目的。

第二种力量，**进步**力量，也就是工人、农民、小資产阶級、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他們的方案要求从印度尼西亚土地上清除帝国主义在政治、經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同时要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坚决貫彻"土地归农民"的口号。

第三种力量，**中間**力量，也就是民族資产阶級；他們的方案是反帝反封建的，为了維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要求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变革，使民族資本主义得以发展。

这三种力量，在生活各个方面，无論是在政治方面或者是經济、文化等方面，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搏斗。最近，这种搏斗在經济方面，尤其是在克服目前經济困难的問題上，表現得最为明显和

突出。

頑固派认为，只有印度尼西亚为外国投資打开大門的情况下，国內的經济困难才能得到克服，因为有了大量的外資在印度尼西亚經营，我們就可从中抽得巨額的稅收作为国家建設的資金。頑固派还談到了靠帝国主义国家貸款的所謂"稳定經济計划"。他們非常积极地聘請帝国主义国家的专家来从事各种研究，把"国际貨币基金組織"之类的建議看成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們投靠具有剝削、統治和保持落后状态的政治綱領的"国际貨币基金組織"。这样一来，在克服經济困难中，他們当然根本不依靠人民，他們指責人民是經济困难的根源，說什么这是因为人民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頑固派根本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經济領域中的外国代理人和叛徒。

頑固派主要包括：在政府中还占据重要职位的右翼社会党人、官僚資本家、买办和中間集团的右翼分子。中間集团的右翼分子本身沒有什么方案，但是巧妙地暗中采納并販卖右翼社会党人的方案。

进步人士认为，应該通过动員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力量和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天然資源来克服印度尼西亚的經济困难。印度尼西亚的資源丰富，土地十分肥沃，人口众多，人民聪明和勤劳。这一切都是建設我国民族經济取之不尽的源泉。把印度尼西亚建成为一个人民生活幸福的国家的一切客观条件都是具备的。

現在，进步的政治与經济方案已經有了，而且甚至已經被正式規定为国家的方針。目前所需要的是建立与我們所要建立的經济結构相适应的政权。然而目前我們还沒有这种政权。这种情况也就成为克服目前經济困难的主要障碍。缺乏这个条件的原因，正如加諾兄經常說的，是因为在某些国家机构的成員的心中和头脑

中还有严重的恐共、恐左、恐人民、恐工人和恐农民的病症。

进步人士认为，眞正的經济援助只能从同我們一起进行反帝斗爭的那些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取得。即使是这种援助，这种外在因素，也只不过是援助而已，就是說，它对印度尼西亚經济的发展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的努力、办法、智慧、勤劳、团結和毅力。进步人士不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而且在經济方面也是爱国主义者。

中間派不表示拒絕进步人士的观点，他們甚至喜欢說：应該信賴自己的力量，印度尼西亚有丰富的天然資源，印度尼西亚人民是勤劳和有能力的。但是他們公开地或在內心里說，"信賴自己的力量"的道路太困难了，时間太长了。因此，他們說我們应該寻找貸款或者是"沒有危害性"的外国投資的外援。

中間派的观点看起来同頑固派的观点不同。的确，就方案而論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一段时期的經驗表明，在实际执行中两者都是一回事，都是使自己依賴外"援"。一旦获得外"援"，中間派就会"忘記""信賴自己的力量"的道路，結果是，到目前为止还沒有为劳动人民創造发揚战斗精神，卷起袖子来克服經济困难的政治条件。

但是，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并不是中間力量的所有集团都"忘記"了"信賴自己的力量"的道路。中間力量的左翼逐漸地认識到，克服經济困难的唯一途徑就是和进步人士一起消除經营管理不善的現象，进行大規模的整頓，他們甚至还同意成立"納沙貢"內閣。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殖民主义的危險是我国的严重危險。这种危險来自热中于邀請外国投資并想要实行靠帝国主义貸款的"稳定經济計划"的反动派。这种危險也来自同样为"沒有危害性"的外国資本打开門戶的中間力量。

无論是外国投資、靠帝国主义貸款的"稳定經济計划"或者"沒有危害性"的外国資本，这一切都是以"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的名义邀請的，所以危險性就变得更加严重。这样一来，在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間，甚至于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間，都不再存在什么区别了。

因此，每一个印度尼西亚的爱国者都不能对我国的經济問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威胁着我們祖国的危險正是由此而产生的。当然，从别的方面来的危險，如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我們也必須加以反对。但是这种危險人民很快就能識破，因而要动員人民起来反对它也容易。帝国主义通过"不知不覚"的、有些人甚至覚得是一种美妙的經济途徑，吞噬和蚕食我国的独立，其結果是，有朝一日当我們醒来的时候，我們会发現我們的国家已經变成一个主要的新殖民地国家了。

因此，在經济領域的斗爭中，我們同样必須遵循爱国主义、人民的三点命令和《政治宣言》的精神，即信賴自己的力量、大公无私和为建設摆脫帝国主义的民族經济进行奋不顾身的斗爭的精神。让我們把經济問題变成为全体爱国者的問題吧！

这就是我們当前面临的三項任务。

三項任务的核心是克服經济困难。所以我們共产党人热烈欢迎苏加諾总統的"胜利年"的演說。总統在演說中表示有能力解决"經济問題的困难"，并且指出主要的弊病在于"恐共、恐左、恐人民、恐工人和恐农民的病症过于严重"。

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解决經济的困难，那么我們就不可能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例如我們就不可能建設西伊里安，带給人民和国家以眞正的安宁，等等。相反的，在西伊里安人民当中甚至会产生不滿情緒，治安不宁的情况将继續存在，等等。

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解决經济的困难，那么頑固派，首先是右翼社会党人和官僚資本家，就有可能更加容易地通过一些重要官員向政府提出他們的新殖民主义經济方案。这些重要官員沒有自己的方案，他們是暗中采納和販卖方案的能手。在經济困难的情况下，中間派很容易囫圇吞棗地接受那种新殖民主义經济方案，結果他們就和頑固派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在这場剧烈的斗爭中，我們一步也不能后退，我們必須使我們的經济方案即有領导的經济或互助合作經济的方案贏得胜利。这个方案的基本內容就是反帝和反封建的經济，这是在《建設計划大綱》（临时人民协商会議第二号决定书）中明确規定了的。

近来，在克服經济困难中，我們在許多人的思想方法中看到了两种进步：

一、人們已經普遍接受这样一种思想：仅仅在金融方面采取措施是不能解决通貨膨脹問題的，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必須采取增加国內生产的方法。几年以前很多人还不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强調生产对解决通貨膨脹問題的重要性就意味着必須眞正认識到《政治宣言》中所說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这一句話，如果沒有工人和农民，就不可能有为克服通貨膨脹所需要的生产。所以，如果要眞正克服通貨膨脹，就必須彻底肅清恐工人病和恐农民病，停止濫发"号令"和采用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商量和协議的办法。

二、人們已經普遍接受这样一种思想：我国經济問題的解决不能和其他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的解决分开来。換句話說，必須建立与我們所要建立的經济結构相适应的政权。历史或目前的事实都证明，一定的經济結构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一定的政权。目前，临时人民协商会議賦予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进步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民主的、全体人民通过互助合作来实現的經

济結构，其中既有社会监督，也有社会支持。但不合理的是，我們目前的政权并不是能够执行这一經济任务的政权。总之，在我們要建立的經济結构与我們目前所拥有的政权之間，还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只能通过成立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內閣来解决，这种內閣是总統方案(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話)、《政治宣言》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議第二号决定书附录甲有关政权問題的部分提出的要求。**当这个矛盾还沒有解决的时候，談論克服經济困难，建設民族經济，更不用說社会主义，都是毫无实际价值的。

从一九六二年末到一九六三年初，成立"納沙貢"內閣的要求是很强烈的。在这段期間內，成立"納沙貢"內閣的要求第一次得到"納沙貢"的支持。在此之前，只有共产党人、进步的群众和加諾兄談到这个問題（加諾兄在总統方案中用了"互助合作內閣"一詞）。現在，成立互助合作內閣或"納沙貢"內閣的要求也得到民族主义政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印度尼西亚党，等等)、宗教政党(白尔蒂伊斯兰教党以及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的地方領导人，等等)的支持。印度尼西亚新聞工作者协会也支持这一要求。所有这一切表現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覚悟大大提高，表現了我国的政治局势的新发展，表現了人們对国家大事、人民的事业以及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的认眞負責的态度。

要求成立"納沙貢"內閣呼声的高漲使得反动派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也說明了中間力量向左发展，进步力量更加壮大和巩固。这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团結更加强大了。

情况就是这样。尽管反动力量和頑固力量还存在而且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在报告談到的时間內，在动員群众鎮压叛乱的斗爭中，在应付西伊里安問題的战斗准备中，在反对乡村地主的斗爭中，在反对經营管理不善的現象的斗爭中，以及在反对由于处于紧

急状态而可能造成的为非作歹行为的斗爭中，反动力量或頑固力量遭到了人民的革命行动的許多打击。

由于頑固力量遭到失敗，由于中間力量的群众和它的一些領导人的政治覚悟日益提高，頑固派在中間力量右翼中的朋友也遭到了失敗。

进步力量之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首先是因为农民和工人的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以及革命知識分子的新覚醒。进步的群众运动在各个战綫上都有了进展。

由于进步力量和民族陣綫日益发展和巩固，所以继續爭取在人民政治自由方面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以及爭取成立互助合作內閣、建立民主的地方政权、廢除战时戒严法令和实行自由民主的普选等等的条件也变得更加有利了。

要求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內閣是科学、客观、民主和爱国的要求。假如不同意成立"納沙貢"內閣，那么有关"建国五原則"、一九四五年宪法、《政治宣言》、互助合作、公正繁荣的社会、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有領导的民主、有領导的經济以及达到革命目标的和平和民主道路等等的言論，都是一种虛伪的表現。

尽管希望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內閣的要求是科学、客观、民主和爱国的要求，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仍然必須十分清醒地认識到，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內閣是力量对比的問題，而且沒有一个阶級是会自願地同其他阶級一起分享政权的。不仅反动的資产阶級不願意同其他阶級分享政权，就是民族資产阶級——如果不是被迫——也不会願意同无产阶級分享政权。所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不要有这种想法：以为参加政权的問題仅仅是科学的眞理問題、仅仅是客观性的問題、仅仅是基于民主原則和爱国主义的公正問題。

目前进步力量确实是强大了，但是中間力量加上右派力量仍是較大的。的确，一部分中間力量，由于群众的压力，已經願意在一个"納沙貢"內閣里同进步力量合作，再也不顧頑固派的威胁了，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間力量依然是頑固派的俘虏。

为了改变力量的对比，以便为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內閣創造足够的条件，我們应該更坚决执行我們六年前制訂的路綫，即**尽力和不倦地发展进步力量，团結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力量**。我們必須通过实行"五更"，即**更勇敢、更机智、更警惕、更坚决**和**更埋头苦干**来执行这条路綫。

对于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和官僚資本家——来說，"納沙貢"內閣是不科学、不客观、不民主和不爱国的，因为他們持有符合他們本身利益的另一种尺度。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加諾兄已經一再强調革命的民族团結的必要性和以"納沙貢"为核心的絕对必要性，但是頑固派和中間力量的右翼，包括一些自称"忠于总統"的政府重要官員却不顧这一切，甚至暗地里反对革命的民族团結和"納沙貢"。为了使人不容易看出他們实际上是反对苏加諾总統和人民的，这些官員也喜欢念念有詞地談論"建国五原則"、一九四五年宪法、《政治宣言》及实施这一切的方針政策。但是，**他們的主要特点是完全不提民族的互助合作的必要性和"納沙貢"核心的絕对必要性。实际上，不談論这一切就等于什么都沒有說，因为沒有民族的互助合作和"納沙貢"，《政治宣言》等等就不可能实現。因此很清楚，在爭取实現《政治宣言》的斗爭的同时，絕对必須进行反对虚伪的《政治宣言》派和假的《政治宣言》派的斗爭。**

我們共产党人不代表老朽力量，我們代表新兴力量。所以，我們將不停地宣傳革命的民族团結的必要性和"納沙貢"核心的絕对必要性。革命的民族团結和"納沙貢"最后必將胜利和实現，这不

仅是因为人民贊同和拥护它，而且首先是因为人民在为之斗爭和牺牲。利己主义、反动行为和得不到人民拥护的頑固派必将失敗。

建立"納沙貢"內閣是任何一个眞正希望通过和平和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所必須采取的第一个政治步驟。假如不贊同建立"納沙貢"內閣，那么一切有关"和平和民主的道路"的言論就純粹是空話。

当然，"納沙貢"內閣还不是在短期內使情况有所改善的絕对保证，但是这种內閣的成立表現人們有集中全民族力量的誠意，而且是反对恐共病的有效步驟。的确，"納沙貢"內閣不是阿拉丁的神灯，但是这种內閣的成立必将为克服困难提供可能性，而有这种可能性总归比完全沒有这种可能性要好，我們这个时期以来所經历过的历届內閣就都沒有提供这种可能性。

为了克服目前的經济困难，必須审查和整肃政府部門、經济部門和財政部門的国家机构以及国营企业的領导。在这方面，我們提出过要求，希望成立苏加諾总統領导的、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整肃委員会。整肃之所以需要，不仅是因为我們要糾正我們的疏忽，即在一九四五年革命初期我們沒有坚决地以嶄新的机构代替殖民地的机构，尤其是因为由于圓桌会議协定的后果和实行了五年多的紧急状态法令的后果，为数甚多的人"任用不当"，即一大批利己主义者在政府部門、經济部門和財政部門占据了不适当的职位，以致成为經营管理不善現象的禍根。

在整肃的問題上，反动派竭力避免人事的更換。他們一直在整肃机构和思想整頓的問題上糾纏，似乎机构和思想同人事毫无关系。他們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提出問題，是由于他們想让現在政府部門中还掌握着許多陣地的反动分子原封不动，使整肃机构和思想整頓的事仅仅是在口头上讲讲而已。这样一来，他們就可以

欺騙整个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們革命派必須强調，最重要的是人事的更換，必須用那些願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和眞正是《政治宣言》派的人来代替那些"任用不当"的人。有了这种人，机构中的缺陷就能得到弥补；相反的，任何机构，如果有那些苏加諾称之为"脑子和心里充滿污秽、生滿銹、不能适应《政治宣言》的人"在里面，都不能用它来为人民服务。

当然，我們不应該低估思想整頓在把落后的人的思想改造成为进步思想方面的重大意义。但是，这样的改造必須正确地进行，現在已經有进行这种全面教育的指示，即苏加諾总統的"胜利年"演說提出的"九点指示"。我們必須继續努力把《政治宣言》和人民群众全面地結合起来。

为了实現三項任务，我們应該抱着敢于冒風險的精神，应該比以前更加勇敢，**为爭取成立"納沙貢"內閣，实現各个方面的整肅和正确地进行基于"九点指示"的全面教育**而继續前进。拒絕这三个条件，就等于反对巩固已經取得的胜利，就是希望我国的經济情况继續恶化，让新殖民主义統治我国。

二、加强国际反帝統一战綫，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同志們：

国际形势表明，加諾兄称之为新兴力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陣綫正越来越发展，并且不断取得胜利，从而迫使帝国主义者后退。

今天西欧的形势清楚地說明了帝国主义陣营的內部冲突是多么尖銳，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是多么紧張。

美国希望有一个統一起来足以对付社会主义陣营的欧洲，但是这个統一的欧洲必須在軍事上、經济上以及政治上依賴和屈从于美国。美国对于想拥有自己的核力量的英国、法国和西德的野心很不高兴。美国和西欧国家一起組成由美国領导和大权独攬的……一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多边核力量。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确要使包括英国在內的整个欧洲只起常規步兵的作用，而美国則是拥有无可爭議的“核牙齿”的独一无二的霸主。

因此，美国强施压力冀使同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能够参加欧洲共同市場，并从而参加成立一个欧洲政治联盟；这样，美国就能够同时把英国在英联邦和非洲的殖民利益夺到手中。

但是，戴高乐在阿登納的帮助下并不願意屈服于美国的霸权。这两个欧洲的老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互相需要。他們把英国看作是美国的代理人，一个可疑分子，必須拒絕它进入欧洲共同市場。西德由于它自己的工业市場的利益，它自己实际上并不拒絕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場，但是由于戴高乐頑固地持拒絕态度，也无法帮助英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場。在戴高乐发表了他的使法国成为独立核力量的核預算之后，几天前签訂了波恩—巴黎协定。这項协定实质上意味着建立一个环繞着波恩—巴黎軸心的把英国排斥在外的“小欧洲”，它在一定限度內不依靠美国。而欧洲共同市場的其他成員也的确担心这个戴高乐—阿登納（軸心）变得越来越强大。今年一月底，他們作出了拒絕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場的决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談判已正式停止。这么一来，肯尼迪的“大战略”的确可以說是失敗了。华盛頓的官方反应确是說，有了这个波恩—巴黎軸心，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就感到不再安全了。西方联盟不論怎样竭力煽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暫时出現的意見分歧，它自己正在崩溃、在瓦解的这一事实是再也无法掩盖的了。

在报告所談到的时間內，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許多确实是非常重大的成就和发展，其中包括苏联成功发射了两艘編队飞行的宇宙飞船。这又一次证明了在关于火箭的科学和技术方面，苏联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絕对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連續几年的巨大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难，由于社会主义經济的威力，現在已被出色地克服了，这特别证明了人民公社的非凡的生命力。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使世界帝国主义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老撾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越南南方的人民軍队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尼赫魯的虛伪的"不結盟"政策，破产的亲帝国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的边界爭端方面，越来越遭到揭露。蔣介石匪帮最近在广东的軍事冒險已被粉碎。在非洲大陆上，誕生了四个新的独立国家：阿尔及利亚、烏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在南北罗得西亚、安哥拉、怯尼亚、桑給巴尔、南非、莫三鼻給、巴苏陀兰、貝专納以及斯威士兰，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大有力。

英雄的古巴人民在各国人民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荣史詩。依靠人民的磐石般的团結，对人民力量——这是最强大的武器——的充分信心，依靠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依靠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領导下的革命政府以及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巨大援助，古巴坚定不移地屹立着，沒有向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侵略或威胁屈膝。古巴人民正在坚决地、毫不动摇地走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古巴人民坚持卡斯特罗的五項要求，保住了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挽救了他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說，最近的加勒比海事件的基本經驗是："不要相信帝国主义者的話"，必須用武力，而不是通过合作或过分的妥协，来对付和战胜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卡斯特罗同志这样說，的确是非

常正确的。

古巴革命和它所产生的两个哈瓦那宣言鼓舞了正在保卫这个革命的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了委內瑞拉、厄瓜多尔、智利、哥斯达黎加、危地馬拉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反抗以美帝国主义者所謂的"爭取进步联盟"为形式的奴役政策。

去年十二月我們的邻居北加里曼丹人民发动起义，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我們感到极大的喜悅。这个英勇的斗爭不仅是北加里曼丹人民的解放道路，而且也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巨大援助，因为这样，为了包圍印度尼西亚而要建立的所謂馬来西亚联邦这道堤壩遭到了冲击和突破。虽然英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将继續企图用他們的馬来西亚来包圍印度尼西亚，但是将被馬来西亚化的人民已經准备向它发动猛攻，同时印度尼西亚人民坚决地全力支持这个正义的斗爭。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爭，的确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必須继續加强这种支持。

所有上述事件清楚地說明，国际形势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独立、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的。

但是帝国主义不想就这样投降。他們的处境愈是窘迫，他們就愈加瘋狂地进行侵略，以便保持自己已經搖搖欲墜的殖民地位。他們继續对老撾人民进行顛复活动，一再企图阻撓老撾人民实現民主的統一。在越南南方，他們在继續加紧进行不宣而战的殖民战爭。在剛果，他們在继續进行搗乱，鎮压人民的解放运动。在安哥拉和非洲的其他地方也沒有例外。美帝国主义者继續在窺伺着古巴，待机发动軍事进攻，对它进行猛扑。他們继續把大笔美元花在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身上，以使他們能够扩大他們的破坏活动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陣营的

力量和团結，閹割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帝国主义者正集中全部精力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实現他們罪恶計划的主要障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的主要危險——現代修正主义者的活动面前，我們党必須不断地揭露他們，不論他們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形式出現。击敗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就是維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团結——加强热爱和平的国际反帝統一战綫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的裂痕面前，兄弟党之間有必要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在相互尊重各党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兄弟般的协商和討論。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共同文件——說：**"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問題时，由这个党的領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領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談和协商。"**

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說来，像对其他共产党一样，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是最近和最根本的共同文件；今天，它們是每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处理党与党之間的关系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普遍斗爭方面必須忠实地遵守和执行的共同指南和綱領。**在实踐中忠于宣言和声明是衡量一个共产党的純洁性的主要尺碼。**

我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从来不相信，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进行論战和互相指責，就会更加容易地解决意見分歧。在邀請其他兄弟党参加的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必須显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在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斗爭中的思

想一致和意志一致。我們党中央委員会政治局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通过的决議中明确地說：我們党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态度是非常正确和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們就沒有参与制造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彼此进行攻击这种恶劣的先例。随着时間的推移，这种态度的正确性已日益得到了证明，党員群众以及我国劳动人民确实深深感到，这种态度是多么正确。

我們在一九六一年預料将出現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互相发动攻击的恶习，这种預料已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德国統一社会党最近举行的各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实所证实。这些代表大会沒有显示全世界共产党人在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斗爭中的思想一致和意志一致。相反地，虽然通过了一些好的决議，这些代表大会在世界无产者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裂痕和爭执。請看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代表是在如何肆无忌憚地利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和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讲坛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吧！

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切爭吵都会降低不論什么地方的共产党人的威信，削弱世界范圍內的共产党的团結，使共产党人对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和一个兄弟党的成就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就使他們不那样努力去向兄弟党吸取教益，对兄弟党的成功或失利不够关心。这是各国共产党領导人必須充分了解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內部存在的現象。我們党了解这种現象，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向党的干部大力强調指出，尽管同其他一些党有意見分歧，我們仍旧必須热情地向兄弟党学习，学习它們成功的經驗，也吸取它們失敗的教訓。我們必須防止对同我們有

意見分歧的兄弟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們必須继續滿腔热情地对待同我們有意見分歧但是仍然反对帝国主义的同志，因为我們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一个共产党人或者一个共产党不論有多么不好，只要他还反对帝国主义，总比一个資产阶級分子或資产阶級政党要好些。

有些人因为我們不願意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这些爭吵，就指責我們不想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方式解决原則問題。这是无中生有的說法。帝国主义者也在大事挑撥，希望我們参加制造爭吵。

我們希望，而且是非常希望原則問題能够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方式解决，也正因为这样，我們才一刻也沒有停止过提出我們主張召开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議的意見；这就是为什么我們欢迎赫魯曉夫同志所說的目前的爭論是一个家庭內部爭論这番話，而且我們建議这种家庭內部的爭論也应当以家庭的方式来解决。我們也欢迎赫魯曉夫同志代表苏共中央委員会在最近举行的德国統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发出的停止共产党之間的論战和停止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来攻击另一个党的呼吁。

我們不希望的，并且也永远不会为我們所同意的是按照社会民主党或者无政府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意見分歧。社会民主党人慣于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解决問題，包括党的內部問題，其結果是使他們的追随者分裂成为許多派系。他們沒有紀律，他們慣于玩弄阴謀詭計，他們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派系的利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发生在共产党人中間，那就不好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习慣是不按任何規章办事，如果他們参加了組織，他們就破坏規章，制造糾紛，这是对人民不利的，尽管他們以为他

們所制造的糾紛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我們共产党人慣于过紀律生活，根据我們自己自覚地規定和遵守的規章生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經有了这些規章，其中最近的一个就是一九六〇年的共产党人的声明。

我們党的中央委員会这許久来一直在号召，而且将来仍然要号召党的干部和党員，通过我們所能获得的材料学习彼此間存在分歧的兄弟党的看法。我們学习这些看法，目的在于从中吸取教訓，以加速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民日报》編輯部甚至已經开辟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专栏，其目的是提供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經发生的問題的参考材料。但是当我們欢迎赫魯曉夫同志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要求停止爭論和互相責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局势平靜下来，以便能够在适当时候召开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会議这个号召时，这个专栏便停办了。

我們希望所有的爭論和互相責难，不論是在言論还是文章中，在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还是反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方面，都将眞正停止下来。我們并不是天眞，但是我們向所有国家的眞誠希望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基础上恢复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和諧的共产党領导人的理智发出呼吁。

中央委員会的这种态度受到我們党的党員的热烈欢迎，因为它表明党的中央委員会充分相信它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它教育党員在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問題上采取批判、謙逊、自信和眞誠的态度。

但是我們也提醒我們的党員，我們当然不应当卷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見分歧的无休止的討論中去，而使我們的队伍在反帝斗爭中丧失昂揚的斗志。反对帝国主义本身及其走狗，要

比知道各兄弟党間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方法方面的意見分歧重要得多。因此，在討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見分歧时，我們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則，在我們的队伍中就会产生疏忽，那就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

就像我們在我們上次的代表大会上說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意見分歧只是在大約拥有四千三百万共产党員的九十来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强大运动中的一个暫时現象，这个运动領导着社会主义国家，并且領导着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修正主义者尽可以說，馬克思主义过时了，但是事实是，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馬克思主义已經显示出而且正在显示出它比那些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哲学优越，显示出它比所有其他的政治和社会概念优越。这是在世界范圍內以及在我們自己的国家內每天每时都发生的事。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正确地指出，現在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义，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要求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进一步揭露目前正处于依賴美帝国主义"援助"地位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并且对它展开积极的斗爭。

我們的党作为眞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将继續反对古典的和現代的修正主义。停止反对修正主义就意味着不再走革命的道路，意味着不去认眞地对帝国主义和其他人民的敌人进行斗爭，而这样行动的党在它自己还沒有发現它已經背棄人民以前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棄。

一个患有修正主义毛病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变得强大起来的；相反，它将变得越来越軟弱，它将日益丧失它的战斗精神，而它的內部分裂将变得越来越严重。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修正主义并不动員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反对他們的敌人，而是把同人民的敌人妥协置于首要地位。一个不能动員自己、不进行殊死斗爭而且

沒有受到革命斗爭的烈火鍛炼的党，就会不断地失去新鮮的血液，不断衰萎，越来越脫离群众，而它的內部团結也不会得到鍛炼和加强。一个不是果敢地和富有战斗精神地进行斗爭的共产党，只能产生披着共产党人外衣的思想陈腐和僵化的官僚主义者，而不会产生眞正的人民領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继續保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光輝傳統，这个傳統是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立之初我們就开始具有的。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我們还进行了幷且仍将继續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古典的教条主义和現代教条主义——的斗爭。长期以来，即自从我們的党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重建以来，我們就一直对古典教条主义展开斗爭，因此今天我們的同志們已經了解，要硬搬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上的"現成"公式，而不考虑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情况，那是錯誤的。在最近这段时期，我們成功地同現代教条主义，即对各兄弟党現在的經驗、結論和綱領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的作法进行了斗爭。当然，我們必須研究各兄弟党最近的經驗、結論和綱領，但是其目的幷不是要不加批判地、愚蠢地和不負責任地把它們变成我們自己的党的东西。这样一种态度，即这种現代教条主义的态度，会很容易地使我們的党同群众和民族脫离，幷且使我們的党不可能成为保卫群众和民族利益的战士。

古典的和現代的修正主义与古典的和現代的教条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对这两者都必須不断地加以反对。这两者都是危險的，但是最大的危險就是我們不去反对它。問題幷不是在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間进行选擇，正像不能在魚毒和蛇毒之間进行选擇一样。在这两者之間是不能进行选擇的，正是由于这个緣故，必須始終不懈地对它們展开进攻和冲击。正是由于这个緣故，要是认

为反对修正主义的人就是教条主义者，而反对教条主义的人就是修正主义者，那都是錯誤的。現代修正主义者甚至非常可能同时又是現代教条主义者，因为这两种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主观主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继續不断地反对古典的和現代的修正主义与古典的和現代的教条主义，他們必須坚持不懈地使自己成为**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又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則**的共产党人。

事情的确应該是这样，因为如果不能坚持这些原則，就不可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則，而如果不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則，那么坚持这些原則就沒有什么用处了。只有灵活性而不坚持原則就意味着机会主义，坚持原則而沒有灵活性則意味着宗派主义。无論是机会主义还是宗派主义都决不能允許它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有立足之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将继續不懈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和崇高威望而斗爭，成为这个强大的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言論和实际行动中貫彻它的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因为他們相信，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爭取民主、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既是爱国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作为爱国者将继續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去而斗爭，換句話說，我們說这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并且我們在这个基础上創造性地确定我們的党的政策、策略、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这是党同群众和全国人民日益团結的基本保证。

* * *

对印度尼西亚来說，在实行以世界上的两种基本力量，即**新兴**

力量和老朽力量对抗的概念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方面，人民和政府之間現在已經有了一个共同基础。这个問題确实是目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問題，就是由于这个緣故，所以必須对这个問題有深刻了解并且加以創造性地发展。

今天新兴力量的发展，就是組成它的那些力量的发展，即社会主义陣营、反帝和反殖民主义新独立国家以及全世界其他进步力量的发展。这些新力量的发展正在逼使老朽力量即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以及全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后退。

这三种新力量中的任何一种力量的每一个增长，都是整个新力量的增长，因此，必須加以支持和援助。北加里曼丹人民为爭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反馬来西亚和反英起义，也是一种新兴力量的发展，因此，我們必須尽我們的全部力量支持和帮助它。借用加諾兄的話来說，我們必須作为原則問題来予以帮助。我們也要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程中取得的胜利，对待曼諾里斯·格列索斯的获釋，对待爭取釋放墨西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被监禁的爱国者的斗爭，对待也門的反封建起义，对待委內瑞拉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爭，对待在剛果粉碎冲伯集团和釋放安托万·基贊加的斗爭，对待越南南方和南朝鮮正在取得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对待古巴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扩張的激烈斗爭，对待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馬来亚等国工人的罢工斗爭。

在这些艰巨的任务面前，印度尼西亚人民絕不能忘記，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无所举动的。非常需要以高度的警惕去識破和击敗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的阴謀，他們时时刻刻都想分裂和挑撥新兴力量的队伍之間的关系。

为此，苏加諾总統关于在今年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議的主張是

非常正确的，我們完全支持这一主張。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亚非的团結一致，以便击敗帝国主义者的阴謀。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南斯拉夫和印度的"不結盟"政策来破坏亚非的团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們可以相信，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議的主張肯定会遇到来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严重阻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想分裂参加討論印中边界問題的科倫坡会議的六国的企图，曾遭到失敗。

印中边界問題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最現实的例子。尼赫魯为了乞求他为克服国內的經济破产所如此迫切需要的美元而对人民中国实行了扩張主义的政策——这是符合美国侵略計划的事情，所以美国給予它在实际上是无限制的援助。实际上，尼赫魯已經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合在一起，从而背离了他亲自参加草拟的万隆十項原則，也叛离了新兴力量。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印度国內一些进步分子已經受了尼赫魯的恶毒的沙文主义煽动的欺騙，結果他們支持他，从而帮助了尼赫魯推行他的扩張主义政策。如果印度进步分子的队伍沒有分裂，如果他們反对尼赫魯的話，尼赫魯和他的伙伴是不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假如尼赫魯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印度的进步运动就会得到"丰碩的收获"，因为人民不願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战爭。

最近的政治經驗表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任务是：加强新兴力量，在国內和国际上建立反帝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坚强团結，以便反对和击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击敗它們的每一个战爭計划和殖民主义侵略。

必須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覚悟和思想意識，必須加强无产阶級組織，以便能够更熟练地和更有能力地动員和团結人民群众

向政府和在国际范圍內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并且为实現这些要求而斗爭。

党必須更熟练地动員人民，以便形成对各种国际問題的正确的輿論，这些問題必須由政府和人民团体在国际讲坛——諸如在亚非作家会議、亚非人民团結理事会經济会議、亚非法律学家会議、在坦噶尼喀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結大会等等——去爭取实現。

党必須作出积极的貢献，使行将召开的亚非新聞工作者会議获得成功。在各友好协会中的工作也必須加强。

党必須使人民成为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直接的和間接的制訂者。人民的輿論是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进步作用的唯一牢固的基础。

我們欢迎和准备尽我們的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貫彻对馬来亚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采取的对抗政策，拉赫曼寡廉鮮耻地企图通过馬来西亚計划来实施帝国主义的包圍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只要馬来西亚計划不全盘放棄，印度尼西亚就有权利尽它的一切力量保卫自己，这不仅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完全符合馬来亚、新加坡、沙撈越、文莱和薩巴人民的利益，因为馬来西亚只不过是以新的、更具有欺騙性的枷鎖来代替旧的奴役枷鎖而已。

为了确保印度尼西亚能够更好地执行历史发展交付給它的任务，决不能出現苏加諾总統制訂一套外交政策方針而政府机构貫彻另一套方針的情况。出現下面的情况怎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呢：一方面，苏加諾总統明确地把社会主义陣营和一切反帝力量列入新兴力量的行列，而把一切帝国主义和它的一切僕从以及一切黑暗的反独立势力列入老朽力量，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机构中却有个别人大力地引进西德和日本新殖民主义势力，招来美国的所謂

“和平队”，搬来美国式的“經济稳定計划”，还有个别人同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南朝鮮当权集团眉来眼去，甚至想要同它建立亲密的关系，还有人对在哈瓦那、平壤和柏林設立同級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机构表示动摇，等等，等等。这样的两重路綫是必須加以消除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需要在外交机构中进行整頓。

进步的外交政策必須由进步人士掌握，而不是由**“脑子和心里充滿汚秽、生滿銹、不能适应政治宣言的人”**去掌握——借用苏加諾总統在他的《我們革命的进程》讲話中所說的話。我們所說的进步人士是具有勇气，再重复一次，是具有勇气的进步人士，是敢于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罪恶阴謀，并且敢于采取看来可能是更加困难，包含更多的風險，但是对人民、祖国和世界上正在出現的新兴力量的发展更为有益的新道路。

三、改进領导方法，并有計划地开展工作，继續前进

同志們：

我們把一九五一年称之为我們党的“新生”年，这是因为在那一年，即在四月間，举行了拟訂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的中央全会。但是这个党章却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間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通过。与通过党章的同时，这次代表大会还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所有基本的和重要的問題，并且規定了两項紧迫任务，那就是：第一，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第二，继續进行党的建設。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的十二年来，或者从一九五四年三月开始的将近九年来，我們为建立民族統一战綫和进行党的建設而

朝夕战斗着。經过这大約十年期間努力工作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成果，那就是：第一，目前已經建立了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民族統一战綫；第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从一个在这項艰巨工作开始初期只有不足一万名党員的党发展成为当前已拥有两百多万名党員的党，过去，它的党員只散布在爪哇，少数在苏門答腊，現在它已經**成了遍布全国各地，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都已經得到巩固的党**。我們之所以說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都已經得到巩固，是因为情况的确如此。不管是对国內政策还是对对外政策所持的态度，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持的态度，我們党內都是意見一致的。此外，还有一百五十多万名的共产主义青年加入人民青年团，他們是我們党的忠实助手，他們也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合計在一起，目前印度尼西亚已經拥有三百五十多万名共产党員和年輕的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些，不論在建立民族統一战綫方面还是在党的建設方面，都是巨大的成績。

談成績完全不是为了驕傲和得意忘形。首先，驕傲和得意忘形不是共产党人的性格。其次，沒有理由可以驕傲和得意忘形，因为我們目前的民族陣綫还沒有足够巩固的基础，我們还須不断地改进和推进农民方面的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目前二百多万的党員人数还不够多，还不足以領导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这个国家的国土的长度相当于从英国到高加索，其人民散布在三千个島屿上。虽然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基本上都获得了巩固，但所有这些都不是絕对的。我們还必須做許多工作来进一步巩固它，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证党內思想、意志和行动的統一。

我們不可能驕傲或得意忘形，因为我們认为，我們为无产阶級

所做的和貢献給它的，必須尽可能是最好的和完美无缺的，因此，我們虽然尽力把工作做好，但对无产阶級来說也还不可能說是够好的了。何况，我們要是还不能把无产阶級和所有的劳动人民从压迫和剝削中解放出来的話，那我們所做的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我們必須估計上述这些成績，使我們的每一个党員都眞正认識到，只要我們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針指导下頑强地工作，那我們的工作是一定会有成績的。因此，我們虽然又年长了十岁左右，增加了許多滿头白发、視力开始衰退而不得不戴上眼鏡的同志，可是我們并不懊悔，因为这十年左右以来我們已經很好地利用了这段岁月，我們已經使自己成为对无产阶級和革命有用的人，即使我們全都对我們已經做了的一切还不感到滿足。現在的問題是，应該怎样最好地利用我們还活着的岁月，比过去更好地使用它。

我們要是說，一九五一年是我們党的"新生"年，那并不意味着我們对已經逝世了的或仍活着的同志們以及我們自己在一九五一年以前进行的活动加以輕視。我們，举例說，对参加一九二六年起义、反抗日本軍国主义、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等等的同志們的功績是給予很高的評价的。要是沒有这些同志，就不会有革命运动，而且也不会有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們說"新生"，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們的党在遭到哈达之流的集团白色恐怖的打击以后又再挺起身来前进，为决心和准备建設眞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挺身前进。

我这次关于党的工作的讲話中将不触及党的建設的全部問題，也不触及群众工作中的全部問題，因为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已經有了关于这两大問題的明确的方針，党中央委員会书記处也发出了关于这两大問題的一些执行方針。

关于党的建設方面，我只想談談改进領导方法問題和关于文化、思想与組織的四年計划的主要問題。而有关改进在民族企业家方面、农民方面的工作的問題和四年計划的詳細指标的問題，将由魯克曼、伊斯迈尔·巴克里和佐哥·苏卓諾等同志分别闡明。

在党的建設中，我們极端重視发展党員和党組織的問題，但是我們认为，对所有入了党的党員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尤为重要。我們把这种看法归納成这么一句話："**組織上的建設很重要，但思想上的建設尤其重要**。"我們应該坚持这种看法，继續进行党的建設。

在党的建設中，我們非常重視有計划地工作。在我們重新建党的最初几年，我們开展工作的計划不是多方面的，而且只是短期的，像三月計划、半年計划或一年計划等，但后来的工作計划就比較长期并且包含比較多的方面。到目前为止，我們已經很好地完成了第一个三年計划，并且再过不久又将完成第二个三年計划。今年四月第二个三年計划就要結束，今年年中将举行全国代表会議来檢查第二个三年計划的执行情况，并制訂新的計划。目前正在进行着"結束阶段运动"以完成或超額完成以**四增**为中心的第二个三年計划的指标，这**四增**是：（一）增設政治学校和人民讲习所；（二）增加党員人数和群众团体成員；（三）增加預备党員的轉正人数；（四）增加党費收入。

不論是为了使"結束阶段运动"取得成功还是为了使未来新的計划取得成功，都需要对領导的方法、方式問題給以最大的注意。有許多同志认为，"結束阶段运动"的成功将会为新計划的执行开辟寬闊的道路，而它的成功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們的領导方法。这种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报告中提到：和执行党的其他任务

一样，在执行計划时“具有决定性的并因而必須严格遵守的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制訂的領导方法，即**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結合以及領导和群众相結合的方法**”，并且“領导方法始終应当同正确的**工作作風**，即**理論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并进行自我批評**的工作作風联系起来”。

我們的党把領导方法看得如此重要，以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决定，要求把領导方法眞正地貫彻下去，并且除了将之作为各級党委的討論材料之外，还在所有的各級党校讲授。但这种領导方法仍未被普遍貫彻；因此凡是对它貫彻得好的地方，党的計划和所有的工作也就进行得好，反之，凡是对它不加貫彻或是貫彻得不好的地方，那么党的計划和所有的工作也就进行得不好。

虽然还存在着沒有貫彻領导方法的地区，但已經有些地区举行了会議，专門总結領导方法的执行經驗和开展了改进領导方法的运动。

在执行每一項任务时我們有两套必須采取的方法，这就是：(一)一般和具体相結合，或者像我們經常說的：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結合；(二)領导和普通党員相結合，或者像我們經常說的：領导和群众相結合。我們要是不向全体有关人員发出一般号召的話，我們就不可能为某項具体任务而把党員群众动員起来。但是，要是領导者**不直接在若干組織中参加这項任务直到具体細节上的执行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績，不随时应用他們剛获得的新經驗来进行領导的話**，那他們也就不可能檢查这个一般号召的正确性或加以发展，甚且这个号召还可能变成毫无用处的东西。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我們必須貫彻以**四增**为中心的第二个三年計划。以四增为中心是正确的，但这四个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却产生了許多具体問題。在增設政治学校和人民讲习所方面

会产生許多具体問題，在增加党員人数和群众团体的成員方面、增加預备党員的轉正人数方面以及增加党費收入方面，也同样会产生許多具体問題。

对决心做出成績并眞正想参加执行这以四增为中心的第二个三年計划的領导来說，他們采取的方法只能是"**深入下层**"，到两个或三个党組織——支部或区委会中去，参加它們的討論会，进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使自己同下层組織在以**四增**为中心的执行方法上存在的具体問題保持接触；并进一步选择若干典型的党員，对他們的政治思想、观点、学习态度和他們取得的成績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直接給这些有关单位——支部或区委会的領导作出指导，帮助他們解决各自单位里发生的一些具体問題。这也是**既給予領导又学习領导的方法**。

要是自己不通过某些单位中的某些事务和某些人以取得具体的或实际的經驗，那么任何一个領导都无法向他的下层单位作一般号召。通过某些組織中的某些事务和某些个人以取得具体經驗以便于进行指导或一般号召的方法，应該在我們党內成为風气。我們不久以前作出的关于党中央委員和它屬下各党委会的所有委員要对他們住所或住所附近支部或区委会生活負責的規定，其重要意义也就在此。这么一来，我們党的領导人就不会脫离生活，脫离党員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活动。不过，我必須在此一提的是，关于这么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仍有不少党委委員还沒有去执行。

由于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結合的方法沒有得到坚决和普遍的貫彻执行，就使得我們不能迅速地改进我們的領导质量。因此，这种領导方法必須加以推行并且对它的貫彻情况进行更好的监督，使所有各級領导都同样貫彻它。只有采取这个途徑我們才能够清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領导方法并代之以符合客观实际的、

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領导方法。

領导方法的第二个問題是領导同普通党員、同群众相結合的問題。这段期間的經驗表明，要使党的全部工作取得成就，包括計划的执行在內，就得建立由团結在有关单位的領导（小組长、书記等）周圍的一批积极分子所組成的領导小組或委員会，而这些积极分子（常务委員、党委会全体委員会委員、各部委員、党团和党組成員等）应該保持着領导者同参加党的工作、包括参加計划执行工作在內的被領导者之間的密切联系。这个領导小組的活动要是不同被領导者紧密地打成一片的話，那它就会变成沒有意义了。因此領导就必須同被領导的普通党員或群众之間相結合。相反的，要是沒有一个領导小組来加以組織，普通党員的活动，群众的活动将不可能持久，并且不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不可能把这些活动提到更高的阶段。

在党員中間正像人民中間一样，可以将之分为**积极的、中間的**和**消极的**这三类人。領导必須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善于把少数积极的人吸收到領导小組里来（让他們当党委委員、各部委員、"工作組"組員、党团和党組成員等），并且依靠他們去推动那些仍居中游的党員們的活动，以及爭取消极分子的支持保证。領导小組和党員之間的眞正团結与巩固的联系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从群众斗爭中間产生出来的。不在群众斗爭中进行鍛炼就不可能产生領导和群众之間的眞正团結与密切联系。

領导小組的陣容有的时候由于斗爭的激烈而必須加以調整，因为在原領导小組的成員中間可能会有些跟不上形势发展并且还成了形势发展的障碍。为了不使党和群众受到損失，这种調整应該进行得及时，既不匆促草率，也不拖拉因循。在群众斗爭中包括在計划执行过程中涌現出来的积极分子，必須加以提拔以代替那

些在領导小組中赶不上形势发展或道德堕落的人。根据經驗，某些地方和党組織在执行計划和执行其他任务中所以失敗的基本原因是：沒有一个始終健全的、同普通党員和被領导群众保持巩固团結和密切联系的領导小組。

我們的党相当长时期以来就认为，正确的領导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然后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領导，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原則的領导。但是許多党干部对这一点还不是理解得很清楚，以致还存在着許多主观主义的、不为群众所理解的領导工作。“从群众中来”的意思是，我們共产党人必須听取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統的意見。我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意見集中起来，經过研究，化为系統的意見，簡单地說，从这些意見中作出科学的結論。然后把这个結論向群众說明并傳播到群众中間去，使群众通过这些結論領会我們提出的意見并使它成为他們自己的意見，不把它当作是一个完全外来的东西，使群众坚决支持这些意見并把它貫彻到行动中去。这样，就考驗了我們提出的意見是否正确。根据这个实踐經驗，我們再一次总結群众的意見，又把这些結論向群众說明并傳播到群众中間去，以致眞正取得群众的支持。这样无限循环下去，使我們的意見越来越接近眞理，在循环的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更重要和更有意义。

所以說，領导的基本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貫彻这个基本方法时，領导必須貫彻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結合的方法，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基本方法的組成部分。我們把这个方法掌握得越好，就越能够更好地进行領导，就越能把領导和群众結合起来。

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知道，某些干部在貫彻計划时只非常重視技术性的問題而忽略了領导方法，那是完全錯誤的。計划的貫

彻問題以及党的任何任务的貫彻問題，都首先不是技术問題而是領导方法的問題。因此，在貫彻第二个三年計划“結束阶段运动”的同时和日后貫彻新計划的开始阶段，都需要开展一次改进領导方法的运动。

在改进領导方法运动中，必須重視把党的綱領和党的每一項政策首先同全体党員，其次同人民群众完全結合在一起的問題。这个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步，全体党員和人民群众才能动員起来进行斗爭，因为他們知道他們斗爭的前景，并且也懂得他們进行斗爭的当前的和实际的目标。貫彻計划是我們为了达到这个斗爭目标而进行的事业中一个重要的組成部分。这項計划的目标，是为党的綱領和党的政策服务的，我們必須把这个目标向全体党員非常詳細地說清楚，而且必須把每一个党員在貫彻計划中所担負的任务交代得清楚。当每一个党員对計划的目标、对自己在貫彻計划中所担負的任务都搞清楚了之后，就要开展“深入下层运动”来貫彻上述两种方法，即(一)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結合；和(二)領导和群众相結合的方法。在改进領导方法时，必須举行会議或业务会議，总結“深入下层”的成績。然后又把这些总結的結果貫彻到下层或交“到群众中去”，考驗它是否正确。随后又再“深入下层”，再举行会議或业务会議进行总結，并把这些总結又再貫彻到下层去；在計划执行期間就是这样无限循环下去的。但是必須始終記住，在計划的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現計划以外的别的同样需要“深入下层”去的問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計划外的問題就应該和計划工作結合起来，它不該成为貫彻計划的障碍，而应該成为貫彻計划的推动力。

改进領导方法是我們的新計划能否成功的关鍵。我們即将在今年年中开始执行的新計划是什么呢？这就是关于文化、思想和

組織問題的四年計划。

这个**文化、思想和組織計划**的中心內容是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組織的問題，它同第二个三年計划并沒有什么不同。这个新計划的教育部分包括两个內容，即关于提高干部文化水平(一般知識和专业知識)方面的教育和关于提高干部思想水平的教育。这也意味着我們的党更加积极地参加了文化革命。

在四年計划中突出**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我們在計划中把思想教育挤到后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不仅是因为要增設更多的党校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这个計划中的文化方面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当前的斗爭阶段要求我們的党現在就得对共产党員干部进行教育，使他們成为具有一般知識和专业知識(具有一定专长)的人，把干部培养为"**既是共产党員又是专家**"。

在貫彻这个四年計划的文化部分时，我們的党必須組織大規模运动来提高包括共产党人在內的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从扫除文盲运动、普及小学教育开始，一直到中学的普通教育、艺术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各种高等院系的教育。

在文化計划中規定全体中央和省級的干部都必須在任何一所**三年制的高等学院**毕业，县級干部必須在相当于高中程度的**人民大学**毕业，区干部必須在相当于初中程度的**人民教育館**毕业，而村級干部則必須在相当于小学程度的**人民教育所**毕业。必須扫除共产党人中間的文盲現象。按照計划，将視各个地方上的能力設立教育机构，建立图书网，而在有关党委会的組織下协助解决书面教材問題。

这項文化計划的草案已經发給部分中央和省委的干部，普遍地受到他們极热烈的欢迎。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我們党內的学

习热情本来就是很高的。

有个别的同志問，我們是不是有能力来实現这个宏偉的計划，师資从什么地方来，經費又从什么地方来。不錯，这个計划确是宏偉的，它需要大量师資，需要經費。我們当然必須准备大量师資，不过大家要知道，当前有許多共产党員知識分子和非党的进步知識分子，他們願意以他們的知識为劳动人民服务，但是他們却不知道把这些知識用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地方过去的确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当然必須筹集經費充作我們建立起来的这些学校的开支，不过大家得知道，我們有許多同志在自己掏腰包买书、繳納讲习班或学校的学費，为的是想从資产阶級的这些书本或教育机构中获得知識。此外，我們还可以发动某一种符合劳动人民利益并因而受到劳动人民支持的募捐运动，我們过去就經常这样作。何况，这項文化計划中提出的項目我們这許久来实际上就已經在做了，只是它还缺乏系統，还沒有加以很好的領导和有效地去进行罢了。

关于四年計划中的**思想**教育方面，我們必須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三年計划期間所进行过的工作的基础上继續进行下去，不过时間比过去还要加速，而且要特别重視各級党校师資的培养和哲学課。对共产党員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教育也得特别重視，使他們在对待各种具体的事物时都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級立場和正确的阶級观点，使共产党員艺术家和作家同劳动人民完全打成一片。馬克思主义不应限于在党內学习，而且也应让党外进步人士在党的帮助下学习。使馬克思主义不仅为共产党人或无产阶級所有，而且还将为全民所有。

关于四年計划中的**組織**部分，我們必須成倍地增加党員人数和群众团体人数。扩大党員的重点应該是：一方面不忽視吸收工人、漁民、青年、大学生、国家公务員、城市貧民等入党的活动，另一

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吸收农民、妇女和知識分子入党。改进党員組成成分的工作也应从各族和外裔公民的角度来考虑进行。

党在农民方面的工作必須进一步改进，到农村进行調查研究的工作必須进一步改进，对农民干部的使用、提拔和教育必須予以特别注意。必須使区党委会成为眞正能够成功地貫彻計划的关鍵。应該把各級党組織的定期討論会更加活跃起来，对理論、党的政策和各种指示以及群众工作进行討論。要把群众团体中的党組搞得更好，而且，应把領导方法也貫彻到革命的群众組織中去。

这就是有关領导方法和有关文化、思想、組織計划中若干重要部分的扼要闡述。

我想再一次提出，我們必須在"結束阶段运动"中取得成就，完成或超額完成第二个三年計划的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們应該在全党鼓起昂揚奋发的精神。"結束阶段运动"的成功将为四年計划的成功开辟广闊的道路。不管是为了"結束阶段运动"的成功还是为了四年計划的成功，我們都得坚决貫彻正确的領导方法。而且，在执行"結束阶段运动"和在执行四年計划中，都应該以无比勇敢的精神进行工作，敢于遵循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五更"路綫去对付我們面前的障碍并勇敢地冲破这些障碍。

亲爱的同志們！

現在我就要結束这个报告了。

我們已經探討了并規定了我們的国内任务、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务在内的国外任务和继續进行党的建設的任务。我們强調在貫彻这些任务时具有勇敢精神的重要性。

目前，有关进步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方案实在提得不少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民族陣綫組織和人民团体这些貫彻上述进步方案的組織工具我們也有了。現在需要的是所有自认为是革

命者和願意改变現状使它有利于人民的人的勇敢，勇敢，再勇敢。

为了維护人民的利益，为了創建新的印度尼西亚，我們呼吁我們的朋友——非党的革命人士更加勇敢地用这样的方式来克服經济困难，即：要以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利益为重，而牺牲少数人即地主、官僚資本家和买办的利益；要消灭城乡大剝削阶級的統治势力；要建立一个符合当前人民日益强烈要求的、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的新政权。

让我們更勇敢地对最主要、最危險、最富于侵略性幷且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最蛮横无理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帝国主义者，进行斗爭吧！

让我們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保证国际反帝与爱好和平的統一战綫力量的强大而奋斗吧！

让我們以更勇敢的精神把出現在继續进行党的建設途中的障碍清除掉吧！我們要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設为一个更广泛、更巩固和拥有**有才干、有勇气**和**有文化**的干部的党！

让我們以三好——**工作好、学习好**和**道德好**的精神来进行这些工作吧！

让我們以敢于冒風險的精神继續前进吧！

勇敢，勇敢，再勇敢！